

论道

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发挥消费对经济现代化的“第一马车”作用

■ 张国华

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必须“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增强消费这个“第一马车”功能的长效机制，形成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政策和活动双轮驱动的促进消费发展格局。



视觉中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要求，切实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

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从三大需求来分析，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都是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而拉动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第一马车”无疑是消费需求。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2023年，美、日、英等主要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消费率)都超过70%，美国和英国更是超过80%。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11到2023年，消费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消费率平均超过53%，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但我国的消费率与现代化发达国家相差10多个甚至20多个百分点，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不够有力，消费潜力、活力和动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激发和发挥，消费需求驱动中国经济现代化仍有相当潜力空间。

进一步扩大消费，在应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更见紧迫和必要。面对经济全球化在一定时期内的回潮迹象，面对供应链区域化加强的态势，面对少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不确定因素，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必须“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增强消费这个“第一马车”功能的长效机制，形成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政策和活动双轮驱动的促进消费发展格局。

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第一，“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大力完善提升社会保障居民消费能力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问题，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一些地区、行业领域的人口消费信心不足，居民的储蓄意愿增强，而不敢消费的情形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原因是随着我国老龄化、少子化程度的加快，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加大，人们养老的储蓄倾向增强。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为2.17亿，占比为15.4%，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当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总人口较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居民储蓄倾向明显上升，2024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总额再增11.4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27万亿元，截至6月末，住户存款余额为147.15万亿元，上半年人均存款约为10.44万元。城市和农村未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的医保、社保等问题，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也值得关注。

为此，可以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适当增加政府公共投入，按照《决定》提出的“合理增加公共

消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努力化解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住房等领域供需突出的问题，强化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居民个人“敢消费”。像德国、英国、瑞典等发达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达到20%左右，而我国大致占15%左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要大力深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强化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必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大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保障投入水平，切实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和未就业年轻人的社保和医保等制度，全面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要切实完善提高各类人群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针对少子化问题，要大力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切实减轻家庭育幼、教育负担。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要加大对政府公共养老、养老投入，加大住宅、楼宇等适老化改造，鼓励企业养老、养老事业发展。这些任务措施的落实将有力促进城乡居民提升消费倾向。比如，安心养老，就可能促使人们放心消费、大胆消费。

以优化供给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第二，优化丰富消费供给，完善以

强大的新供给激活引领满足创造消费需求的新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6年就指出，“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

一要提升丰富供给能力，必须深化改革，“减少限制性措施”，强化优化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监管制度供给。比如，对于一些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等，目前还存在一些与国际高标准规则不相符合的备案、审批环节，有些时间、制度成本还比较高，增加了供给创新预期的不稳定性。夜间经济、露营地等的发展必须提升精细化管理和服务保障水平。住房、汽车等消费在一些城市也存在一些限制性政策，尤其是汽车在道路行驶、停车地点选择等方面在大城市普遍存在不便利、不甚科学的规定。

二是要大力鼓励和保护创新，“积极推进首发经济”。提高国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程度，鼓励企业开发各类首店、首展、首秀、首推各类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时尚消费潮流。

三是要“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大力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近十年来，我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增长明显快于同期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多数年份都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今年一些城市的演唱会、展览会等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要大力拓

展会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的消费场景，举办多种服务业态相互赋能的节庆活动。

以增加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第三，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长效机制。影响消费能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疑是收入。一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促进鼓励扩大城乡居民就业，稳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就业。

二是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分城乡看，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6.1%，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60.8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7.6%，平均消费倾向81.59%。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和平均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城镇居民，促进农村居民增收能更好地促消费。要“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序鼓励房屋、农村土地经营权等财产出租、入股。

三是强化对资本市场、平台经济等的监管，推动资本相关投资和就业及收入平稳增长。比如，推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按股东权益分红，加强对平台上有关费率、成果引导，确保快递员、中小微企业主的收入合理增长。

优化消费环境 增强居民获得感

第四，“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优化净化消费环境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创新消费市场的制度供给，支持商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采取开放包容审慎监管模式。要以开放促改革，坚决提高市场监管标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完善商品和商业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支持制定符合国际惯例、体现最高水平的商品服务标准，推动有条件的尽量与国际高标准同线同标同质。要让国内国际市场与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无缝对接，真正有利于我国商品和服务在面向全球的竞争中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调动地方加大消费市场建设投入，促进信用消费，打造近悦远来的消费市场。“推进消费各环节环节后移并逐步下划地方”，消费各环节很可能从生产地征收变为消费地征收，有利于推动各地更加重视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个别地方消费市场鱼龙混杂，不讲信用现象不仅使消费者权益备受侵害，也消减了消费者对我国消费市场的信任，损害了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要下大力气，改善优化市场信用环境，探索以商务信用为核心的现代流通治理模式，让诚信成为成功者的通行证，失信成为失败者的墓志铭。要下大力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强化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三是要“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完善吸引境外人员在中国消费的长效机制。比如借鉴一些国家的消费中心城市如伦敦、东京、纽约、巴黎等城市的经验，这些城市把吸引中国消费者作为城市繁荣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巴黎、东京、伦敦、纽约等一些城市的知名品牌专卖店和部分商场，配备中文导购已经成为标准配置，法兰克福、东京、首尔等一些店铺商品的下方还设有中文标识，欧洲的许多商场、专卖店都安装了银联卡支付刷卡系统，退税等也有懂中文的负责。上海等大都市应进一步加大对卡支付刷卡系统的建设，提高外卡使用的便利度。应积极为境外人士在国内就医、生活对接境外保险机构或参保国内保险提供通道，鼓励国内医院为境外人士就医提供适当的便利，努力成为境外人士在国内旅游、参加展会、演出等提供国际通行的管理规范。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消费”的要求，促进放心消费、安心消费、舒心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发展。(作者为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一级巡视员)

观点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 石晋昕

碳达峰碳中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全会为此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理念方面

应当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关键词，坚持先立后破。要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当前与长远、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态度要积极，方式要稳妥，在坚定践行“双碳”承诺的同时要把把握好实现的方式和节奏。不能搞项目下马“一刀切”，也不能盲目进行“碳冲刺”，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稳步推进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全面低碳转型。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要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在促进低碳发展的同时保障经济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在面向西方国家通过碳关税、碳盘查等方式制造国际贸易“小院高墙”时，要积极主动应对，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碳足迹核算规则，建立产品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和报告体系，主动披露信息，同时要防止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地缘政治的放大器和意识形态的烟雾弹。

路径方面

应当秉持系统思维，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功能结合起来，有机融合生态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应对、产业结构调整、能源体系优化、循环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治理目标。要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从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明确各类污染物排放的考核指标和各类指标之间的关系，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不断提升碳汇水平，通过建设社区生态花园、大规模国土绿化等方式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加绿色空间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从生态修复到生态产品服务的跃迁。以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和含绿量。

过程方面

应当推进政府、市场和社会联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政府层面，优化政府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在企业层面，积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布局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在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的同时打造一批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激发全国碳交易市场活力，促进企业在碳交易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在社会层面，持续推进“碳普惠”平台、场景、数据、激励等方面的制度创新，鼓励公众形成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约资源的良好生活习惯。进一步建设低碳社区和低碳实践区试点，从基层实践中总结提炼绿色低碳发展的优秀经验，在多元共治的发展格局中推进低碳工作体系建设走深走实。

保障方面

应当强化制度建设，完善标准计量体系。要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加快全国及地方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研究，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可靠数据支撑。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手段为碳排放充分赋能，为低碳发展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提供充分准备。要完善碳达峰碳中和认证制度，优化市场监管规则，实现产品全产业链和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认证，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高效的信息披露平台，发展“碳信用”，用好“碳资产”，提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聚焦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建立覆盖范围广、数据质量高、国际影响力强的全国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强化碳足迹核算数据底座。此外，要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积极发展绿色金融。(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锐见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

■ 冀福俊

国家标准，加强制度约束和标准引领，促进技术改造、消费提质和循环畅通。其次是完善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通过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重点突破，提升产业基础能力，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探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最后是建立未来产业增长机制。未来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还处于萌芽时期，却拥有巨大的成长潜力，正成为塑造全球格局的活跃因素。通过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把投资资本、金融、耐心资本的力量发挥出来；加强前瞻性布局，支持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适应性监管体系，支持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大胆探索试错。此外，鼓励地方探索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加快构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中试基地、应用场景体系、科创资金体系等，为未来产业提供完善的孵化服务。

区域布局的因地制宜

各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要充

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构建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具有坚实产业基础、丰富科教资源和良好营商环境的区域，应通过链主企业和产业联盟等提升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发挥“科学家+企业家”的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效应。这些区域应优化用地、资金、能源和数据等资源要素配置，建立资源共享、成果共用、平台共建、生态共融机制，聚焦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高精尖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力争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对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等一些拥有战略科技力量优势的城市，应整合全流程要素资源，超前部署一批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颠覆性技术与创新平台，支持与国际城市进行科技合作，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全球技术策源地。对于资源禀赋充裕、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的西部地区，应加快风能、光伏等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同时聚焦于某些细分赛道，着力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通过结合各地实际精准分类指导，明确各区域发展定位，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创新策略的因地制宜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要素，要统筹做好“从0到1”的原始创新和“从1到100”的应用创新。一是立足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开展“从0到1”的原始创新。当前国际竞争向基础研究领域前移，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原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是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有利于形成关键领域先发优势。二是立足于发挥工业门类齐全的产业基础优势，开展“从1到100”的应用创新。从“1到100”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理论研究走向产品市场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应遴选部分技术趋于成熟、工艺相对完善、处于大规模产业化边缘的突破点集中发力，积极打造标志性产品。

要把握好“从0到1”的原创突破与“从1到100”的应用接力关系，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才能双重驱动。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布局为原始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动力，如鼓励自由探索与原创性研究，优化评审机制，强化对非共识及变革性研究的支持；构建人才培养平台，实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优秀人才提供长期稳定资助，加强后备力量培养；改革资助管理机制，完善多元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各界投入基础研究，提升联合基金资助效能。同时，加速将科技成果应用于产业，打破转化障碍，通过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与市场需求的有机对接。如构建科技中

介服务体系，提供技术评估、市场分析和资金筹措等一站式服务促进校企合作，搭建沟通平台。

企业定位的因地制宜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担其责，各展其长。国有企业通常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在产业引领和技术突破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民营企业则以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机制灵活的优势，在产业配套和创新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协同合作，优势互补。

一方面，国有企业需以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为指导，全面实施新型举国体制，在研发周期长、投资大、民营企业参与意愿低的领域进行重点投入，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创造更多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打造一批未来的“独角兽”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了全社会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新发展阶段，应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保护和激发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加大对创业初期和种子期企业的支持，培育关键领域的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和具有特色的创新产业集群。此外，还需加强民营企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不同所有制和规模的产业形成创新联合体，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共同建设产学研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和协同创新中心，对于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和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